

# 竞争与(不)平等:湖南凤凰苗寨游家庭餐馆的个案研究

丰向红

(美国东密歇根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犯罪学系,密歇根 易普斯兰堤 48197)

**[摘要]**文章通过对湖南凤凰县苗寨游家庭餐馆经营的田野调查,透过“有限利益”和与之相关的“竞争为平等”的观点来探索新经济背景下农民旅游创业及其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从“有限利益”的角度来看,农民社会不是因为缺乏理性而保守,而是个人的超前在传统社会环境下被视为对社群稳定构成威胁。目前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从“无限利益”和“竞争为领先”的观点出发,主张个体而不是集体的富足,加深了社会不平等,与基于“有限利益”和“竞争为平等”的传统农民世界观矛盾。通过对比传统农民社会和全球化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有助于对农民创业的经济行为的理解,从而更有效地推进相关农村发展项目,为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和公平发展带来启示。

**[关键词]**苗寨游;农民创业;有限利益;竞争为平等;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3-0026-09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3.008

## 引言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费孝通和张之毅就指出,在土地有限、财富累积缓慢的村庄,没有多少途径可以使无地农民成为地主,使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成为大地主。从事农业没有办法真正超前,要想致富必须离开农业<sup>[1]</sup>。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继“民工潮”之后掀起了“创业潮”,特别是近年来,“三农”问题的迅速凸显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使得农民转型与创业致富的相关研究显得尤为紧迫<sup>[2]</sup>。然而,与这种紧迫性相对立的是,研究领域中的农民创业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忽视,有关旅游语境中农民创业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国内对其研究日渐丰富,多从宏观角度探讨社区参与的现状、方式、成效和问题,其中深入探索在旅游语境下农村文化因

素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的研究相对缺乏<sup>[3]</sup>。旅游行业的低门槛鼓励了农民创业<sup>[4]</sup>,涉足旅游的农民创业随之增多。本文以龙村<sup>①</sup>为例,通过对湖南凤凰县苗寨游家庭餐馆经营的田野调查,探索旅游语境下传统农民世界观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以增进对其日常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理解。龙村的个案折射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的急剧变迁。探讨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民创业及其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有助于探索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更有效地推进农村项目,实现改善农民生活的良好意图。

## 1 相关文献

关于凤凰旅游近10年的发展(从早期黄龙洞公司买断经营权到后期乡村游),在笔者早先发表的若干论文中已根据相关的田野调查资料从不同理论视角和论题做出阐述<sup>[5-11]</sup>。本文旨在透过“有限利益”(limited good)和与之相关的“竞争为平等”(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的观点,通过对龙村家庭餐馆经营的个案研究分析旅游语境下农民创业中的合作和竞争,展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旅游创业带来的少数民族村庄日常生活的变迁。

作为农民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限利益”观点仍然在当今许多农民社群中处于主导地位<sup>[12]</sup>。在“有限利益”观点主导的社群中,个人的财富积累被视为是以同一社群中别人的损失为代价。在一个封闭的社群中(比如农民社会)就会这样。然而,即使是一个传统的村庄,也可以接触到外部其他社会系统(社区之外的“大社会”),也就是说,个人能从村庄以外赚取财富从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sup>②</sup>。这样的成功虽然被羡慕,但不会被视为对村庄稳定的直接威胁,因为村庄里没

**[收稿日期]**2015-05-26; **[修订日期]**2016-01-16

**[作者简介]**丰向红(1978—),女,湖南邵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E-mail: xfeng@emich.edu。

① 龙村不是该村庄的真名。

② 在如今转型中的农民社会,外出务工是最常见的获取外界财富的途径。

有人因此利益受损。即便如此,这样的成功也必须被解释清楚<sup>[13-14]</sup>。

针对“有限利益”的竞争,是一种“为平等”(而不是“为超前”)的竞争。“竞争为平等”最先被 Foster<sup>[13]</sup>、Bailey<sup>[15-16]</sup>和 Scott<sup>[17]</sup>作为农民社会的特性而提出。“技能和精力被用来保持人们原来的位置:他们为保持原位而尽力奔跑”<sup>[16]</sup>。根据此种观点,农民的社会性本能地抗拒创业中的创新和发展。Bailey<sup>[16]</sup>阐述道,竞争通常主要发生在平等的或差不多平等的人之间,因为权力和地位的差距使人相距甚远而无法竞争。这种悖论是:人们维持平等是因为每个人相信其他人在尽量超过他,为了保护自己,他想方设法确使无人超前。在这样的社会中,平等实际是每个人相信别人都在尽力超越平等的结果。平等是通过所谓的为不平等付出的努力的相互抵消。根据 Tucker<sup>[18]</sup>对格雷美地区旅游的研究,创业村民经常把“嫉妒”作为村里商业行为的一个显著问题来提出,抱怨有些人不惜一切(包括让自己受损失)来阻止别人赢取比他应得的更多的利益从而领先。因而,“嫉妒”在此起到了平等机制的作用,是旨在恢复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防御性反应,而不是借此提高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

与“有限利益”观点一脉相承的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依附理论(比如 Frank<sup>[19]</sup>)和“世界体系”分析(比如 Wallerstein<sup>[20]</sup>)中的“零和”(“zero-sum”)世界观。Nash<sup>[21]</sup>对比讨论了“无限利益”(经济学家长期提倡的开放系统模式)和“有限利益”/“零和”(封闭系统模式),并指出用“有限利益”取代“无限利益”世界观,有助于我们探求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外的以可持续和公正为目标的替代发展计划。Nash 认为:Foster 提出的从经验得来的“有限利益”模式,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保守,而且可以培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性实践。“有限利益”这种更加平衡的观点主张通过生产回报的再分配来实现集体利益,从而倡导可持续发展,来避免以无限利益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少数人受益而造成的贫困幽灵<sup>[21]</sup>。继 Nash 之后, Trawick 和 Hornborg<sup>[22]</sup>更深入讨论了两种世界观的区别,并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为达到公正和可持续的发展,用“有限利益”取代“无限利益”世界观是必须的。

正如 Nash 所说,“我希望能拯救 Foster 的有关农民世界观的观点,(因为)它可能会对世界人口的可持续未来带来启示”<sup>[21]</sup>,本文在旅游语境下重拾

“有限利益”和“竞争为平等”的观点,以龙村为个案,借此更深入理解农村文化因素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从而更有效地推进相关农村发展项目,为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和公平发展带来启示。

## 2 田野数据

笔者第一次到凤凰是 2002 年,做有关苗族手工艺的民俗调研。2005—2014 年,笔者先后 6 次暑期到凤凰进行与旅游相关的文化人类学课题的田野调查:开始是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评估凤凰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影响的博士论文的研究<sup>[5-7]</sup>,后来是由此衍生的以凤凰为个案从不同理论框架(比如性别角色、社会空间、资源贫困、日常抗争)探讨旅游语境下乡村生活的变迁<sup>[8-11]</sup>。具体调查地点从最初的凤凰古城(沱江镇)扩展到其周边乡镇的 4 个村庄(包括龙村)。本文使用的田野数据主要收集于 2010—2013 年笔者在凤凰(特别是龙村)的调查。

2010—2013 年,笔者共进行了 65 人次个人深度访谈和 6 个焦点群体访谈。被访谈者代表当地旅游的不同方面。这些被访谈者的选择或是有目的地根据他们的社会角色(比如县级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私人发展商、旅游公司经理和职员、旅行社老板和雇员、村干部和其他村民),或是根据各种关系的引荐。他们中有些是从 2002 年就参与笔者的研究课题的长期被访问对象,并且在不同时期参与了多次访谈。笔者还在当地不同的旅游景点随机访谈游客。实地观察、日常闲聊以及只有在当地才能获取到的档案资料(包括县政府和旅游公司的报告和其他书面材料)都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笔者注重就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和来源收集数据,尽量使数据全面,代表有冲突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立场。访谈在被访谈者的家中或他们的办公室里,或是在市场上、饭馆里、酒店大堂的茶座里进行。访谈用笔记或在被许可时用录音记录。访谈用普通话或湖南方言进行。少数被访谈者是偏僻村庄的苗族老人,只会说苗语。2012 年和 2013 年,笔者利用所任职大学提供的部分研究基金在当地招募了一个会苗语的研究助手兼翻译。她当时是当地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在沱江镇的一所旅行社做暑期兼职导游。只有部分相关数据用在本文中。

## 3 凤凰旅游

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转向恰逢与之

平行的全球资本世界新自由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涉及本地和外来资本利益的融合,以及在吸引外界资本的过程中当地政府的转型;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维持着国家领导人对市场化进程的实质性掌控,将国有企业(国营经济稳定的关键)和逐步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相结合<sup>[23]</sup>①。在此国际国内环境下,当地政府在过去的十余年大力提倡以大规模资本密集型旅游发展来改善凤凰贫困的状况<sup>②</sup>。

2001年,总部位于长沙的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凤凰县人民政府签订《湖南省凤凰县8个旅游景区(点)经营权转让合同》,以近10亿元获得凤凰县八大景点50年经营权。依据合同,作为黄龙洞公司的子公司,以经营开发凤凰八大旅游景点为主的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1月1日正式成立,位于租赁的属于县财政局的一栋办公楼内。从2002年开始,凤凰的旅游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1)首先集中于凤凰县城沱江镇的古城区,由凤凰古城文化旅游公司垄断经营<sup>③</sup>; (2)然后扩展到凤凰乡村,通过由其他私人老板投资发展“乡村游”(主要是以民族文化和乡村景色为特色的苗寨游)<sup>④</sup>。

凤凰游客数量从2001年的56.7万人到2011年的600.14万人,增长了近11倍<sup>⑤</sup>。凤凰的游客主要是国内游客(汉族居多),多为大学生和中低收入家庭。由于旅游花费预算有限,他们大部分选择跟团游,特别是去交通不便的乡村苗寨游。从事旅游小生意的当地居民清楚这些游客的消费能力和砍价的习惯。就像他们其中一位曾说的:“这些旅行团的游客交完团费后,也就预备花费几百块左右;如果他们有一两万块花在旅游上,就不会跟团游了。”

在全国从2006年以来大力提倡乡村游的背景下<sup>⑥</sup>,凤凰热情鼓励乡村游的发展,以此作为把集中在古城区的游客从县城分散到周边乡村的策略。县政府认为乡村游能有效解决凤凰旅游的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它能减轻凤凰古城(作为县交通住宿旅游中心)的压力,因其现有的基础设施无法应付从2002年以来大量涌入的游客;其次,它能帮助扭转旅游经济利益在黄龙洞公司和当地广大农村社区间分配极不均衡的局面。很多当地村民也欢迎乡村游的发展,渴望由此在旅游市场占有较公平的份额。至2011年,凤凰全县共有18家正规乡村游的景点,其中大部分是苗寨游。龙村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村落原貌保存较完整,汉化程度相对较低,成为乡村游中更有人气的一个苗寨。

#### 4 龙村简况

龙村共有176户。在旅游发展之前,龙村是一个苗族聚居贫困村,苗族习俗保存尚好。龙村的农业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一般种植水稻、玉米和小菜。饲养几头猪,农历年杀猪熏制腊肉,保存得当的腊肉可吃大半年,新鲜肉则不常吃。部分村民曾种植烟叶,供给凤凰烟厂<sup>⑦</sup>。龙村以“雷公田”为主,依赖雨水。旅游发展前贫富差距不显著,社会压力基于道义经济的平均主义。互助合作是日常生活的常景,特别是收稻子、建房、新年杀猪、葬礼、婚礼的时候。村民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山林边界纠纷,或村民和村干部因计划生育引起的冲突。

龙村于1996年通电,2002年开始修公路。未修路前,村民主要依赖步行(约1个小时)到镇上去赶场或去搭车出行。至今没有连接村和镇的公共交通工具。2005年,两个本地私人老板和村里签了40年协议在龙村投资发展旅游。第一年给村里2000元,第二年4000元。当时最多一天100多个游客。2007年陆<sup>⑧</sup>接手。陆是湖南怀化人。陆给村里的景点费是每年8000元,由陆垄断所有的门票收入。据陆说,2008年(“五一”时开业)有3万多游客,2009年8万多,2010年16万多,2011年约有20万。

村支书说村里有些老人以前不同意搞旅游,因为心里有点恨汉族把苗族赶到山区里来。他回忆说在他小时候,村里大人管教小孩时总会说:“你不要吵,吵的话就把你卖到汉族那里去。”但现在这些

① 参考 Walker 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语境的详细讨论<sup>[23]</sup>。

② 凤凰曾是全国和全省贫困县之一。2000年,全国和全省人均GDP分别是7066元和5626元,凤凰的人均GDP却只有2079元。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凤凰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编写的内部资料《凤凰县城镇体系规划(2002—2020)》。

③ 笔者的博士论文对由凤凰县政府和黄龙洞公司联手推进的资本密集型的旅游发展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做了初步评估。评估发现:只有少数的当地居民共享一小部分的经济利益,但是多数当地居民却要付出代价,比如环境恶化和社会矛盾。以此推论,来自较发达地区的投入并不总是使经济落后的地区获益,因为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可能导致落后地区不能自立、财富外流、结构性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当地居民的怨恨。参照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对此的详细阐述<sup>[7]</sup>。

④ 有关凤凰乡村游的讨论详见笔者的另一篇论文<sup>[9]</sup>。

⑤ 数据来源于凤凰县统计局编写的内部资料《凤凰统计年鉴2001》和《凤凰统计年鉴2011》。

⑥ 由国家旅游局确定的2006年全国旅游宣传主题为“2006中国乡村旅游”,宣传口号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

⑦ 凤凰烟厂曾是凤凰经济的支柱,于1997年倒闭。

⑧ 本文所有人名均为匿名。

老人看到游客来了也很欢迎。因为外出打工或旅游发展提供的机会,多数龙村成年男性成为雇佣工或小本生意经营者,即使他们的家庭继续从事以自给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据村支书介绍,龙村最初有60%~70%的村民在外打工,2011年只有30%了。很多人选择回村里或在县城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

政府或集体在一段时间内将旅游资源与品牌的经营权出让给外来投资者是我国乡村游发展的常见模式<sup>[24]</sup>。在这种模式下,外来投资者以资金输入的形式获得旅游资源使用权,负责景区建设、宣传促销、收取门票并垄断门票收入;社区居民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旅游开发决策中来,也无法直接分享旅游开发带来的诸多好处<sup>[25-26]</sup>。龙村也不例外。陆在龙村发展苗寨游,没有刻意创造机会让村民获益。陆的员工大部分是从龙村以外雇来的,比如管理人员、歌舞演员、导游和司机。2011年村里几位老婆婆每日分块清扫游客活动区域,从陆那每月领取200元的补助;还有几个年轻村民在村子下面的水库撑船接游客,陆开给他们每人每月700元的工资。有村民开玩笑说,“幸好他们还没讨老婆,不然那点工钱怎么养得活一家人。”在龙村从事旅游业的村民主要靠摆摊卖纪念品,租苗服给游客照相,在镇上和村里之间用小商务车接送散客,或开家庭餐馆给旅游团提供团队餐从中获益。

## 5 龙村游客餐馆的分合兴衰

### 5.1 合作

村支书的“农夫餐馆”是村里第一家餐馆,于2009年下半年开张。两三个月后,增加了一家;半年后,变成3家。到2011年有6家:农夫餐馆、苗家餐馆、友情餐馆、山里人家餐馆、会友餐馆和笑迎宾餐馆。友情餐馆在2010年“五一”时开张,由4户亲房合伙,包括井、井的堂弟和村秘书在内。2010年夏笔者开始对凤凰乡村游产生兴趣,报团作为游客体验了在龙村的苗寨一日游,由导游安排到友情餐馆吃团队午餐。那是笔者第一次来到龙村,正值友情开张3个月,生意不错,井和他堂弟,还有村秘书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几个月后,井和他堂弟因为经营餐馆意见分歧闹矛盾;井退出,在自己家开了山里人家餐馆。他和他堂弟之后两年都没说过话。2010年友情餐馆总利润将近10万元,先退出的井得了2万元,其他3户每户分得2万6000元。

2011年夏笔者来到龙村做正式的田野调查,以下是对村秘书访谈的节录:

笔者:“井退出后,今年的利润是不是高一点?”

村秘书:“要是游客和去年一样,我们今年3户应该比去年利润更大。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比不上去年。”

笔者:“为什么大家都是几户一起弄呢?人越多利润不就少了吗?”

村秘书:“太少也不行。因为游客是团队,人多啊。比如8~9点钟报餐,11点半吃饭,(每桌)9个菜,你人少了忙不过来。”

笔者:“所以主要是人手问题啰,不是资金问题?”

村秘书:“所以你至少都要(有)3户。如果你一户只能出一个人,那必须要请人,不然忙不过来。”

笔者:“那为什么不您一户搞,别的人手都请,岂不是利润更高一点?”

村秘书:“请人也要看情况来。游客多的时候,请人可以,就赚钱;游客少的时候,请人就划不来。比如淡季时,自己的人不算什么工钱不工钱,时间就一起花到这里。如果一天才十几二十个客人,请人干利润都没有来,菜还要本钱呢。”

笔者:“那可以这样吗:人少就自己家的人,人多再请人?也不一定要几户一起合伙啊?”

村秘书:“像我们3户,每户出2个人,就是6个人。如果报餐一两百人,甚至三百人,我都不要请人。”

笔者:“那这3户合伙是怎么合的?当初每人出的一样的钱?”

村秘书:“是的。出一样的钱。”

笔者:“那房子呢?”

村秘书:“房子就是他(指另外两户中的一户)家里的。我们都没有开他的房租。水是山寨水,水费都不要开。在凤凰(指县城),(或者)在镇上,你还要交税。现在我这里税都不要上。不要上税,也不要开房租费。”

笔者:“那分利润时,房主有没有多分一点?”

村秘书:“这个是我们3家商量的,自己有协议的。他不要就不要,你送他他都不要。他愿意给合伙开餐馆用,他也不要。”

井经营的山里人家餐馆,算是村里生意最好的餐馆。井40来岁,矮小精干,外向健谈。井主要负责联络客源、接待客人、买菜和收钱。他大姐负责洗菜洗碗,他妻弟管炒菜,他老婆忙完家里的事情也会在厨房帮手。如果是暑期,他在县城读中学的大女儿放假在家也会帮手。偶尔客人特别多时,会从村里临时请一两个人帮工一天。2012年国庆节

前,井花了7万多买了一辆可坐8人的手动小商务车,说服在浙江打工的会开车的忠(井的三弟)回来和他一起搞餐馆的生意。忠回来后,早上在餐馆帮忙切菜,白天在村里停车场用这台车做出租车的生意送散客到镇上,傍晚或和井一起或独自开车去县城的菜市场买餐馆第二天所需的食材。

忠把出租车的收入每天如数交给井。每个月餐馆和出租车的利润合在一起,分成3份,井1份,忠1份,还有他们的大姐1份。车是井一个人出钱买的,所以这3份不是平均分配:忠和姐姐的那份每个月扣2000元,当是他们买车的份子钱。不是旺季的话,忠每月分得两三千块钱。7月、8月暑期是旺季。2013年8月的一天,笔者陪忠出车从村里送游客到镇上,他顺道去镇上的银行存钱,存了3000元。那个月他去银行存了两次钱,而那个山月里人家的利润将近6万元。

## 5.2 竞争

一面是传统的团结和合作,另一面是竞争和摩擦。黄海珠<sup>[25]</sup>以广西龙胜平安村为个案探讨少数民族乡村旅游多元利益主体的非和谐因素。平安村是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中发展旅游业最快、旅游收益最高、也是矛盾最突出的一个村,包括村民之间的矛盾。村民为抢夺客源,相互拉客压价,无序竞争导致反目的事情时有发生。龙村餐馆间的激烈竞争也不是秘密。一次笔者拜访家在镇上的发(井的二弟)时,发的老婆说龙村看起来团结,其实内部很多冲突,并特别提到村里餐馆抢客人的情况。导游一般提前给餐馆打电话订团队餐,让餐馆知道要准备多少人的饭菜。有时导游带游客去订好餐的餐馆吃饭,路过另一家餐馆,这家路过的餐馆会拉游客进去吃饭。如果游客跟着去了,导游也没办法。这样订餐的那家餐馆不但失去了生意,而且浪费了准备好的饭菜。

生意不好的餐馆,守着空桌空椅,眼见成群结队的游客由导游带着去别家餐馆。村里每日用餐游客的流向如同对每家餐馆经营能力差异的公开展示。在某种程度上对经营餐馆的村民来说,面子似乎比利润更要紧。各家餐馆每天留意各种游客数量:在他家吃饭的游客数,去别家吃饭的游客数,村里的总游客数。在彼此攀比用餐游客数量时,餐馆之间很快出现了价格战,紧随着的是对彼此的不满:因为价格的降低,他们要拉更多客人,准备更多饭菜,甚至不惜降低饭菜质量,才勉强获得(有时还

达不到)降价前的利润。导游收取的回扣高导致餐馆的利润空间小:餐馆一般按人头从导游那每位收10元,管吃饱;而导游从游客收取的餐费是每位50元。餐馆的成本包括购买食材所需的本钱和交通费,以及准备食材、招待游客、清扫餐馆的劳力,还有导游和司机的免费就餐。

2012年年初,村支书组织6家餐馆开了个会,提出到年底为止统一定价餐费每位10元。会上大家同意了。之后3家餐馆执行了两个月,发现生意少了很多。原来另外3家实际收的餐费是每位8元。经常带游客团到龙村的当地旅行社的导游华说,“这些降价的餐馆想的是:我们一样的价格,但是你的客人为什么那么多?然后我就直接降了,可能我的客人也比较多了。”华解释道,“如果别家餐馆质问,他们会说:你的客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让我们降价呢?如果我降价,可能我也有同样多的客人。”村支书说通过降价虽然拉到更多的客人,但是利润可能并没有增加,“他(降价的餐馆)就没有想到这些啊。反正你游客比我多了,必须我跟上你;要跟上你,我就把价钱压下来,压下来。”

基于市场经济原理,良性竞争应当着眼于通过提高旅游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以及差异化程度。但是,这一做法不仅需要一定资本支持,而且付出的成本及收益周期远大于拉客等短期经营行为。因此,与陈志永和况志国<sup>[27]</sup>描述的贵州郎德苗寨村民之间的竞争相似,龙村经营家庭餐馆的村民宁愿采取拉客等短期获利行为,而不是从长期效益出发选择改善经营质量和水平。其结果是大家都选择拉客,因为在其他村民都拉客时,自己放弃这一策略,将意味着个人收益的损失。相互拉客造成村民渐生嫌隙,矛盾日增。

“越发展,矛盾越多,”村秘书把此归结于村民没有文化,感叹道,“农村人就是目光短浅。我们村平均主义严重。是的,平均主义的问题!”村干部和陆经常抱怨他们在龙村推进旅游的工作很难做,因为村民的思想太落后,太愚昧,不讲道理。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把少数民族贫穷的根源归结于没有文化的主流认知<sup>①</sup>。为什么这些在他们看

① 笔者在凤凰经常听到类似的抱怨。一位县团委的官员在和笔者谈到当地苗族农民的思想落后程度,曾举一则笑谈和龙村同一个镇的另一个苗寨比龙村还偏僻,没有公路,走路要3个多小时才到镇上。政府派扶贫工作队去给他们修路,让他们出劳力卸一下沙,但他们要政府给钱才卸。她说,“这些人真是(不可理喻),政府给他们办事,他们还跟政府要钱,还说不要政府给他们修路,说修了路,计划生育的就容易来了,而且可能把他们养的猪都运走了。”

来是改善村民生活的良好意图和举措,会遭遇村民们如此的不情愿呢?从“有限利益”的角度来看,农民社会不是因为缺乏理性而保守,他们的保守不是由于思想落后,而是因为个人的发展在传统社会环境下被视为对社群稳定构成威胁,从而千方百计阻止现状的改变<sup>[13]</sup>。这种针对“有限利益”的竞争,是一种为平等的竞争。

2013年下半年友情餐馆关闭。村秘书抱怨现在做团队餐生意很难:谁的成本低,给导游的回扣高,谁就客人多。餐馆生意结束后,他就照顾两岁半的孙子,好让他在村里表演场附近做照相生意的小儿子专心做事。差不多同时关闭的还有苗家餐馆。苗家餐馆是包括老支书(现任村支书的前任)在内的5户合开的。因为后来没有什么客人,开了两年就关门了。接着,老支书在自己家里接待散客点餐,起名“老支书餐馆”。老支书说,“我不怎么想做团队餐,餐费太低了,没什么钱赚。”笔者有时到老支书家串门,偶尔遇到客人多、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帮着洗菜切菜。但客人多的时候很少。由于老支书家离游客在村里的必经路远,生意不好。有一次笔者搭忠的顺风车去县城,经过镇上时,他看到路边有人在砌房子,提到老支书因为餐馆生意不好,有时会到镇上来给人做小工砌房。到2014年夏,村里只剩下山里人家、会友和笑迎宾3家做团队餐的餐馆。

## 6 讨论

Nash在墨西哥恰帕斯的调查中发现,那些尝试新的增加收入方式的村民通常会寻求合伙人来共同担负创造利润的风险<sup>[21]</sup>。与之类似,龙村的家庭餐馆大多是由几户亲房合开。这种合作经营是建立在日常互助关系上的,以信任为基础。劳力是穷人的最大财富<sup>[28]</sup>。比起雇佣劳力,他们更愿意依赖合伙的自己人的“免费”劳力。在亲属关系上衍生的合伙生意以资源(比如餐馆场地)和费用共享降低了创业门槛,尽管同时也意味着平均利润的减少。这体现了农民传统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减低风险,安全(而非利润)为首。

Chayanov<sup>[29]</sup>对革命前俄国农民的研究认为,农民经济遵循自身的逻辑和原则,不能单纯以价格、供需关系和利润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学模型来解读。因为小农“全年的劳作乃是在整个家庭为满足其收支平衡的需要之驱使下进行的”,不是为了在

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在生产上只靠农家自有的劳动力,而不依赖雇用劳动力。费用共享和劳力互惠的关系网是农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由它构成了“农民的道义经济”<sup>[17]</sup>。农民学经典论题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sup>[17,30]</sup>,围绕农民经济受“道义”还是“理性”支配,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sup>①</sup>。李丽在对贵州郎德苗寨村民发展乡村游中设立“工分制”的个案研究中指出,郎德的“工分制”既体现了“道义经济”所强调的互惠公平及“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也体现了“理性小农”所概括的权力冲突和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竞争<sup>[32]</sup>。

基于对墨西哥恰帕斯的暴力事件上升的研究,Nash<sup>[21]</sup>发现,“任何人只要展露出一点点财富都会招来强烈的嫉妒。”在评论Trawick和Hornborg的文章时,Cliggett<sup>[22]</sup>提到根据她在赞米比亚的调查,也发现不少因嫉妒引起的暴力案例。因为别人的嫉妒,一个以受教育为途径来争取过更好生活的有上进心的人被人用农药投毒,另一个人在他辛苦经营的小生意开始有回报时被人烧了鸡圈。在龙村,每天的游客数是固定的,而且每位游客的花费预算是有限的,因而是“有限利益”,可被视为系统(村庄)内部财富,不同于外出打工获取的外部财富。在原本几乎户户贫困的龙村,由旅游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增长加剧了嫉妒引发的日常冲突。在谈到“公地悲剧”时,Hardin<sup>[33]</sup>说:每个人被锁在一个系统中,使得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被迫无限增加他的畜群。这在某种程度上与Foster的“有限利益”观点相呼应。龙村餐馆经营者无法增加每日作为潜在客户的村里游客的总数,游客的吃饭消费对他们来说是“有限利益”,可视为“公地”,因而有可能被“过度放牧”,体现为无序竞争,拉客压价并不惜降低饭菜质量。

在龙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村民间相互熟悉讲究面子。因而,在经营餐馆的村民之间,拉客不仅是为了利润,更是为了面子,因为在每家餐馆用餐的游客数量好比是对其经营者们能力差异的公开展示。然而,只有在那些经常接触的人面前,村民才要刻意经营别人对他的印象;他的声誉的重要性随着互动频率的降低而减少<sup>[16]</sup>。下次游客再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村民倾向于将与游客的本次交易视为唯一交易,甚至以降低饭菜质量来降低成本,从而得以生存。

“有限利益”这种封闭系统的 worldview,从理论上

① 对此的详细综述可参考文献[31-32]。

讲,一方面可能导致嫉妒和相互不信任(如Foster<sup>[13]</sup>着重阐述),另一方面可能鼓励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和广泛合作(如Trawick和Hornborg<sup>[22]</sup>所强调)。Dipert<sup>[34]</sup>提出非正式合作协议和正式合作协议两种合作安排,并偏好前者。Tucker<sup>[18]</sup>根据她对土耳其格雷美地区旅游的研究指出:“竞争为平等”在小地方可能更激烈;这可以归结于由于地方小,能见性高,比如任何餐馆可以看到别的餐馆的菜单、装修和服务。同理推之,能见性高也可促使合作:地方小,公开性高,个人行为可被观察到,从而对之产生约束作用。社区成员的守规可以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协议及相关的模糊的社会压力(比如皱眉、盯着看、闲言碎语)来实现<sup>[21]</sup>。

Hardin<sup>[33]</sup>提出避免公地悲剧的两种解决方法:(1)由国家权威强制约束个体行为;(2)使资源私有化,以便资源通过市场以更自私和更有竞争力的方式被分配。这两种解决方法要么是集权主义,要么是自由企业的个人主义<sup>[35]</sup>。Trawick和Hornborg<sup>[22]</sup>提出第3种解决方法:在相对小规模区域或在地方一级,在没有外人提供的相关约束制度的环境,人们可以依赖他们自己来避免“公地悲剧”。为纠正相互压价拉客的无序竞争,龙村餐馆经营者曾通过开会协商试图统一餐费定价,虽然最终未被贯彻执行,这样的集体协议是可以实现的,可持续的。龙村村民的中转车经营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所谓“中转车”指的是村民购买的用来接送散客来回村里和镇上的小商务车。2013年,村里中转车最多的时候有近10台,每天一早停在村后门的停车场接散客生意。所有中转车都排了序,每天井然有序地轮流接客。如果哪次轮到自己但错过了,就要重新等下一轮。最初每趟车费是50元。2013年暑期游客高峰来临前,村里中转车的司机们商量了一下,统一涨到每趟60元。村里中转车经营者之间的集体协议保证了资源的平均分配,有效避免了以相互压价拉客的无序竞争。与餐馆经营相比,中转车经营相对简单,体现在:(1)经营者与游客直接打交道,没有导游作为中介;(2)经营成本一样,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途径来压低成本;(3)经营者间能见性更高,更容易促使合作。

## 7 结束语

通过对比传统农民社会和全球化社会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表1),有助于理解农民创业的经济行为背后的逻辑。农民的保守不应简单地归于思

表1 传统农民社会和全球化社会的世界观的对比  
**Tab. 1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peasant society and the globalized society worldviews**

传统农民社会 Traditional peasant society	全球化社会 Globalized society
封闭系统 A closed-system	开放系统 An open-system
有限利益 The "limited good"	无限利益 The "unlimited good"
竞争为平等 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	竞争为领先 Competing to get ahead
生存理性(熟人社会“面子为大”)Survival rationality (In acquaintances society, "face" matters most)	经济理性(商品社会“效益优先”)Economic rationality (In commodity society, profit takes priority)

想落后。正如李丽<sup>[32]</sup>指出,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的区别不是非理性和理性的区别,而是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区别。生存理性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不被视为经济理性,但仍然出于理性。生存理性的理性不是基于效益,而是基于公正。与发展相关的官方话语以“竞争为领先”倡导个人先富,而“有限利益”的农民世界观以“竞争为平等”主张集体共同富裕。

龙村的案例并非特例。郎德苗寨村民说:“我们要改革,但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找准路子;我们希望富,但要慢慢地富,大家一起富;我们不要暴发,要的是细水长流。”<sup>[36]</sup>不单是苗族村民,参与乡村游的其他少数民族村民也有同样诉求。从对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和广西阳朔世外桃源的调查,孙九霞总结当地村民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参与状态表现为参与积极性高、参与程度低和参与过程中矛盾普遍存在。她指出乡村旅游参与中的村民“更多要求在眼下得到均等的经济利益。”<sup>[26]</sup>

在旅游发展中,当地村民可能认同与发展相关的部分官方话语,渴望达到物质富足。但目前从“无限利益”观点出发的“竞争为领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强调个体而不是集体的富足,加深了社会不平等,与传统农民世界观的“有限利益”和“竞争为平等”矛盾。基于平均主义的社会压力(比如嫉妒)成为他们追求不但富足而且平等的一种有效机制。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造成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倾斜的收入和资源的分配<sup>[37]</sup>。这种日益激烈的“为领先”的竞争持续加剧了社会经济差别。不平等具有社会腐蚀性。不平等会破坏信任、凝聚力和互助性。减少不平等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sup>[38]</sup>。用基于封闭系统的“有限利益”农民世界观取代主流经济学家提倡的基于开放系统的“无限

利益”观点可能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发展所必须的。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Fei H T, Chang C I.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227.
- [2] Wei Xufang, Luo Biliang. Farmer entrepreneurship: A literature review[J]. *China Management Studies*, 2014, 9(3): 187-208. [危旭芳, 罗必良. 农民创业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 [J]. 中大管理研究, 2014, 9(3): 187-208.]
- [3] Xie Xiaoqin, Jian Xiaoying. Localized reflection on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36(3): 47-53. [谢小芹, 简小鹰.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的本土化反思[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3): 47-53.]
- [4] Komppula R. The role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ness for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 361-371.
- [5] Feng Xianghong. Comparison of two village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s in Fenghuang County, China[J]. *Journal of Northwest Anthropology*, 2007, 41(2): 205-216.
- [6] Feng Xianghong. Gender and Hmong women s handicrafts in Fenghuang s Tourism Great Leap Forward , China[J]. *Anthropology of Work Review*, 2007, 28 (3): 17-26.
- [7] Feng Xianghong. Who benefit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Fenghuang County, China[J]. *Human Organization*, 2008, 67(2): 207-220.
- [8] Feng Xianghong. From labor to capital: Tourism and the poverty of resources in rural ethnic China[J].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2, 41(2/3/4): 329-365.
- [9] Feng Xianghong. Who are the hosts?: Village tours in Fenghuang, China[J]. *Human Organization*, 2012, 71(4): 383-394.
- [10] Feng Xianghong. Women s work, men s work: Gender and tourism among the Miao in rural China[J]. *Anthropology of Work Review*, 2013, 34(1): 2-14.
- [11] Feng Xianghong. Protesting power: Everyday resistance in a touristic Chinese Miao Village[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5, 13(3): 225-243.
- [12] Ploeg J D. *The New Peasantri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M]. London: Earthscan, 2008: 113-142.
- [13] Foster G. 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5, 67(2): 293-315.
- [14] Foster G. A second look at limited good[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1972, 45(2): 57-64.
- [15] Bailey F G. *Stratagems and Spoils: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9: 86-110.
- [16] Bailey F G. *Gifts and Poison: The Politics of Reputa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1: 1-26.
- [17] Scott J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54.
- [18] Tucker H. Peasant-entrepreneurs: A longitudinal ethnograph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37(4): 927-946.
- [19] Frank A G.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J]. *Monthly Review*, 1966, 18(4): 17-31.
- [20] 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1-410.
- [21] Nash J. The notion of the limited good and the specter of the unlimited good[A]// Nash J. *Practicing Ethnograph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n Anthropological Odyssey*[M]. Walnut Creek: Altamira, 2007: 35-54.
- [22] Trawick P, Hornborg A. Revisiting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On sustainability, thermodynamics, and the illusion of creating wealth[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5, 56(1): 1-27.
- [23] Walker, K. From covert to overt: Everyday peasant politics in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ransnational agrarian movements [J].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2008, 8(2-3): 462-488.
- [24] Zou Tongqian, et al. *Rural Tourism: Theories and Cases*[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55. [邹统钎, 等. 乡村旅游: 理论 案例[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1-255.]
- [25] Huang Haizhu. The exploration of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ethnic tourism and the non-harmonious factors among them: The case of Ping-an Village in Longsheng, Guangxi[J]. *Guangxi Social Science*, 2006, 32(5): 59-64. [黄海珠. 民族旅游多元利益主体非和谐因素探讨——以广西龙胜平安村为例[J]. 广西社会科学, 2006, (10): 74-77.]
- [26] Sun Jiuxia. Staying on the farmland and the participatory rural community tourism: The participation status and causes of peasants in community tourism[J]. *Thinking*, 2006, 32(5): 59-64. [孙九霞. 守土与乡村社区旅游参与: 农民在社区旅游中的参与状态及成因[J]. 思想战线, 2006, 32(5): 59-64.]
- [27] Chen Zhiyong, Kuang Zhiguo. The dilemma of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mmunity-centere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ang-de Miao Village[J]. *Academic Exploration*, 2009, (3): 72-79. [陈志永, 况志国. 朗德苗寨社区主导旅游发展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困境[J]. 学术探索, 2009, (3): 72-79.]
- [28] Gonzalez de la Rocha M. From the resources of poverty to the poverty of resources? The erosion of a survival model[J].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001, 28(4): 72-100.
- [29] Chayanov A V. *Peasant Farm Organization*[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6: 70-89. [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70-89.]
- [30] Popkin S L.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1-268.
- [31] Austen R A. The moral economy of witchcraft: An essay in comparative history[A]// Comaroff L J, Comaroff J. *Modernity and Its Malcontents: Ritual and Power in Post-Colonial Africa*



-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89-110.
- [32] Li Li. *Morality, Rationality and Habit in Gong-fen System of Lang-de Village: Field Research about Behavior Choice of Peasants*[D]. Guiyang: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2008. [李丽. 朗德工分制中的道义、理性与惯习: 农民行为选择的田野研究[D].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 2008.]
- [33]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 162 (3859): 1243-1248.
- [34] Dipert R. Sidestepp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A]// Machan T. *The Commons: Its Tragedies and Other Follies*[M].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1: 27-58.
- [35] Ostrom E, Burger J, Field C B, et al. Revisiting the commons: Local lessons, global challenges[J]. *Science*, 1999, 284(5412): 278-282.
- [36] Li Li, Wang Xiaomei. Gong-fen system: The determination and hesitation of Lang-d Village[EB/OL]. gzrb.gog.cn/system/2004/05/28/000619334.shtml, 2016-01-16. [李丽, 王小梅. 工分制: 朗德的坚守与徘徊[EB/OL]. gzrb.gog.cn/system/2004/05/28/000619334.shtml, 2016-01-16.
- [37] Davies B J, Sandstrom S, Shorrocks A, et al.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EB/OL]. www.wider.unu.edu/sites/default/files/dp2008-03.pdf, 2016-01-16.
- [38] Wilkinson R, Pickett K.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y Stronger*[M]. New York: Bloomsbury, 2011: 33.

## Competition and (In)equa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Family Restaurants in a Touristic Miao Village in Fenghuang County of Hunan, China

FENG Xiangh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thropology, and Criminology,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Ypsilanti 48197, US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a “limited good” and associated “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 viewpoint to an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of family restaurants in Longcun, a touristic Miao village in Fenghuang County of Hunan, China. It discusses th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these restaurants that provide standard meals to tour groups, and explores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in a tourism context and the rationality behind their economic behaviors. The view of “limited good” sees social division of wealth holistically, in which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for some means wealth being taken away from others (a closed-system worldview). From the view of “limited good”, the conservativeness of peasant society should 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rationality; rather, their conservativenes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one individual’s gain in a traditional social environment tends to be perceived as threat to community stability.

In this tourism development context, the villagers may have outwardly adopted elements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discourse”, and desire to achieve material affluence. But the current neoliberal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is derived from an open-system worldview that emphasizes “unlimited good” and “competing to get ahead”, advocates individual rather than collective prosperity and deepens social inequality. It contradicts the closed-system worldview of “limited good” and “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 among traditional peasant societies where social pressure based on egalitarian morality (e.g. envy and jealousy) works as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strive for not only prosperity, but also equality.

The case of Longcun has broader implications. It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ationality behind the economic behaviors of peasant entrepreneur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evant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it sheds light on sustainable common prosperity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It suggests that it might be time to consider replacing the open-system worldview of the “unlimited good” promoted by the mainstream economists with the closed-system peasant worldview of the “limited good”.

**Keywords:** touristic Miao Village;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limited good; competing to remain equ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庞世明; 责任校对: 魏云洁]